

现代化背景下的青年婚配观念与实践

主持人 孙 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高质量婚姻关乎个人幸福、子女健康和社会和谐,而低质量婚姻则充斥着不满与冲突,成为结婚率持续走低和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的重要原因。评价婚姻质量离不开爱情和物质环境,本专题关注中国进入物质丰裕社会后,两种婚配模式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一是关注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新特征,二是关注赘婿择偶新趋势与家庭角色变化的新特征。

在《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一文中,作者关注在“个体化”和“资本化”突出的当代社会中,夫妻双方因为个体在社会中所获取和使用的资本能力的不同而产生的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带来的影响。作者基于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采用CFPS2020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夫妻双方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增加,会对婚姻满意度带来负面影响。近年来,有关赘婿的网络话题热度持续高涨,网络小说、微信公众号、微博热搜、百度资讯和贴吧社区等平台中处处可见它的身影,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小人物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积极态度,充满着励志和正能量,而且从中可以隐隐捕捉到这个时代普通人在大的社会变迁中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赘婿择偶新趋势和家庭角色重塑》一文中,作者关注社会变迁对赘婿观念和家庭婚姻质量的影响,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发现当代赘婿择偶出现了男女双方“强强联合”的新趋势,也带来了赘婿在家庭角色和利益互惠上的新变化。由此带来的启示是转变婚育观念和营造平等的家庭关系有助于应对中国的婚育挑战。

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 杨妮超 孙 凤

(福建警察学院 公安管理系,福建 福州 350007;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本文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成长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夫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FPS2020数据的研究显示,夫妻间的经济资本差异、文化资本差

收稿日期:2024-08-10

作者简介:杨妮超,福建警察学院公安管理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婚姻和暴力;

孙 凤(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异、社会资本差异均会降低青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城乡、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青年夫妻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夫妻经济资本差异对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村、中西部青年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作用,夫妻社会资本差异对城市、东部、中西部青年的婚姻满意度都有负面影响。本研究揭示了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作用,启发学界关注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夫妻的资本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婚姻问题。

【关键词】青年夫妻 资本差异 婚姻质量 城乡差异 地区差异

一、问题提出

婚姻生活占据大多数人的大半部人生,高质量婚姻是关乎个人幸福、子女健康、社会和谐的重要稳定剂。然而,婚姻并不总是和谐美好的,也充斥着不满与冲突。较低的婚姻满意度是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时有发生骇人听闻的家暴事件更使很多青年,尤其是女性青年对婚姻望而却步。2023年,中国离婚夫妻约360万对,其中法院判决、调解离婚的约101万对,离婚率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1]。过去二十年,年轻人口结婚推迟趋势明显,女性结婚意愿更低^[2]。提升青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保持婚姻稳定、促进人口增长有重要意义。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很多,本文基于现代化进程中两性在不平等境遇下获取的资本不同,从“夫妻资本差异”出发研究青年婚姻满意度问题。

夫妻资本差异一直存在,既表现为传统婚姻观念下“门不当户不对”的资本差异,也表现为现代夫妻在社会中所能接触、获取和使用的资本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夫妻资本差异是一种与传统社会中以维护家族利益为目的的婚姻模式相反的婚姻组合,夫妻的资本差异也并非绝对的个人资本差异,而更多体现的是双方家族的资本差异。后者的夫妻资本差异则形成于“个体化”^①的社会结构中,两性既有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不平等境遇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放大,投射在家庭中表现为夫妻双方的资本不对等。在少子化、家庭日趋核心化的社会背景下,家族资本也被青年个人资本所表达。因此,本文从个体层面的夫妻资本差异出发,以成长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夫妻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相对资源理论关注夫妻资源差异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最早由美国学者布拉德(Robert O.Blood)和沃尔夫(Donald M.Wolfe)提出,认为夫妻教育、职业和收入等资源差异会影响夫妻间的权力关系,资源多的一方在决策时处于有利地位。该理论旨在呼吁自尊、陪伴与理解这些弥合婚姻问题的向上力量,以满足夫妻对美好婚姻生活的预期^[3]。有研究发现,夫妻

① 个体化社会作为专有名词,来自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一书,本书中译本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资源差异的确会影响婚姻满意度。例如,丈夫的收入或教育程度高于妻子,均会提高妻子对丈夫的满意度^[4-5]。

然而,夫妻资源差异并不总是能满足夫妻双方对婚姻的美好预期,还隐藏着夫妻关系的失衡与不稳定^[6]。实证研究发现,妻子的收入更高或受教育程度更高均会降低夫妻的婚姻满意度^[7-10],丈夫相对较高或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降低夫妻的婚姻满意度^[11-12]。对此,相对资源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夫妻资源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尤其不能解释夫妻资源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负作用。

现有研究也存在其他有待完善之处。第一,现有研究多以全年龄段夫妻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全年龄段群体的婚姻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在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夫妻群体尤其值得关注。第二,除了经济和文化要素,人脉等社会资源在“关系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既有研究对夫妻社会资源差异考虑不足。第三,有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幸福指数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呈现为城镇高于农村、东部高于中西部的特点^[13],而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成因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因此,本文基于新的理论视角,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展开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关注这一影响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二)理论框架

布拉德和沃尔夫提出相对资源理论的初衷在于探讨存在资源差异的夫妻为了满足婚姻需求而无意识地调整权力,达成一种动态协作的婚姻满意状态。夫妻双方为了满足自己对于情感、性、陪伴或为人父母的需求,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的协商关系。为婚姻提供更多资源的一方意识到自己的贡献和价值,从而自发地获得权力,接受方因依赖于对方的付出而感到亏欠,从而自动配合这种权力分配模式^[14]。在个体化社会结构中,夫妻双方为了实现婚姻的自我愿景,甚至会无意识地评估、利用、计算双方资源,进行全方位争夺以实现自身对婚姻的期许。结合当今时代背景,为清晰描述青年夫妻资源二次处理的特点,本文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资本(capital)是布迪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15]。个体不仅处于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还根据力量进行不平等的斗争和对抗。资本既是行动者斗争的工具,又是行动者斗争的对象。布迪厄的资本类型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被公众承认后产生的符号资本^[16]。与客观的相对资源概念相比,“资本差异”更能体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夫妻在婚姻场域资本对赌游戏中对于位置点的争夺和由此导致的婚姻不满。因此,本文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以“夫妻资本差异”为出发点,从经济资本差异、文化资本差异、社会资本差异三个方面来研究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夫妻因收入不同而形成经济资本差异,因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不同而形成文化资本差异。社会资本来源于具有稳定性的社会关系网所提供的资源总和^[17],包括个人、家庭、团体社会资本三个维度。

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其一,以“夫妻资本差异”为出发点研究婚姻满意度问题,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夫妻资本差异导致夫妻资本争夺的研究,隐含着夫妻资本

差异对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的预设。其二,与以往对全年龄段群体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聚焦成长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夫妻,关注个体化社会结构中的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其三,本文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加入了对夫妻社会资本差异的研究,这是以往研究鲜少关注的内容。其四,本文关注了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自2010年起正式实施,每两年进行一次,至今已完成了6轮调查。本文使用2020年的调查数据。CFPS以家庭为单位,分别调查了所抽取家庭中的夫妻。本研究根据配偶编码匹配女性样本的丈夫,形成夫妻双方年龄在35岁以下、包含双方信息的已婚或同居样本。处理缺失值后,夫妻对的样本量为1050,男女合并后的总样本量为2100。

(二)变量与模型

婚姻满意度由个人“对当前这段婚姻或同居生活有多满意”来衡量,共包含“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个选项,用1~5表示,数值越大表示婚姻满意度越高。

经济资本差异用收入差异表示。收入差异用丈夫去年收入与夫妻去年总收入之比得到,将丈夫收入占夫妻总收入比值在25%~75%范围内的设定为“夫妻收入相当”,将占比75%以上的设置为“丈夫收入更高”,将占比25%以下的设置为“妻子收入更高”^[18]①,其中“夫妻收入相当”为基准组。

文化资本差异用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表示。受教育程度类别包括从文盲/半文盲到博士共8类,编码为1~8,数值越大表示文化程度越高,夫妻比较后形成“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同”“丈夫受教育程度更高”“妻子受教育程度更高”三类,其中“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同”为参照组。

社会资本是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提供的资源总和,所能联系的人数规模、亲属占比是婚姻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19]。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夫妻各自的人缘关系评价可以较好反应个体所能联系的人数,即社会网络规模。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夫妻资本差异,因此家庭总人情支出这一常见的反映社会网络规模的衡量指标未被采纳。对婚姻中的青年个体而言,亲属提供的资源支持不容忽视,在家庭日趋小型化的社会背景下,亲属介入婚姻的概率减小,而双方父母提供的照料差异深入影响夫妻情感关系,是研究青年婚姻满意度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部分研究中,职业声望也是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20],但在本研究中,夫妻

① 有学者指出,妻子收入占比是否达到25%、75%是两个比较特殊的夫妻差异点,当妻子收入不足夫妻总收入的25%,即丈夫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75%时,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会增加男性施暴的可能性。

职业声望差异可以通过以收入差异衡量的经济资本差异体现,而且青年群体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对此不做考虑,但将个体职业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此外,本文借鉴了晏月平^[21]对育龄群体的生育研究,将团体社会资本纳入研究,同时借鉴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层次,将用人缘关系衡量的社会资本归为个人社会资本,将由父母帮助料理家务或照顾孩子衡量的社会资本归为家庭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差异用夫妻人缘关系差异表示,取值范围为0~10,数值越大表示人缘关系越好,夫妻相减后根据是否相差三档及以内分别设定为“夫妻人缘关系差不多”“丈夫人缘关系更好”“妻子人缘关系更好”三类,将“夫妻人缘关系差不多”设为参照组。家庭社会资本差异由双方父母是否帮助料理家务或照顾孩子来表示,比较双方父母的帮助情况后形成“双方父母都帮助/都不帮助”“仅丈夫父母帮助照料”“仅妻子父母帮助照料”三类,其中“双方父母都帮助/都不帮助”为参照组。将是否加入工会、宗教信仰团体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纳入团体社会资本,分别计算夫妻加入社会团体的总数,参与团体数量越多表示团体社会资本越高,夫妻比较后形成“夫妻团体社会资本相同”“丈夫参与团体多”“妻子参与团体多”三类。

控制变量的选择。性别分工观念同样影响婚姻满意度和婚姻稳定性^[22],成长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群体难免会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因此将性别观念作为控制变量。个人的性别观念由对“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这一传统性别分工的认同度来衡量,取值为1~5,数值越大表示越同意,即性别观念越传统。夫妻比较后形成“夫妻性别观念差不多”“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妻子性别观念更传统”三类。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职业类型、是否中共党员、户口、地区、子女数量。由于个体的资本变量与夫妻资本差异变量存在相关性,参考已有夫妻资源差异的研究^[23-24],本研究未将个体资本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中国男性和女性对于婚姻满意度有明显差别^[25],本文延续既有研究的做法,分别研究夫妻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鉴于因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夫妻双方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影响,择偶偏好也导致夫妻双方的个体特质存在相关性,本文借鉴卿石松^[26]对夫妻生育意愿的研究,采用似不相关(SUR)模型对回归系数差异进行检验。在城市和农村、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回归中同样采用似不相关模型检验夫妻间的回归系数差异。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2100)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百分比/均值
因变量	婚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	0.67%
		不满意=2	1.38%
		一般=3	9.71%
		比较满意=4	24.14%
		非常满意=5	64.10%

(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百分比/均值
自变量	经济资本差异	夫妻收入相当=0	33.14%
		丈夫收入更高=1	38.57%
		妻子收入更高=2	28.29%
	文化资本差异	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同=0	86.57%
		丈夫受教育程度更高=1	6.76%
		妻子受教育程度更高=2	6.67%
	个人社会资本差异	夫妻人缘关系差不多=0	88.67%
		丈夫人缘关系更好=1	5.43%
		妻子人缘关系更好=2	5.90%
	家庭社会资本差异	双方父母都帮助/都不帮助=0	36.76%
		仅丈夫父母帮助照料=1	48.19%
		仅妻子父母帮助照料=2	15.05%
	团体社会资本差异	夫妻团体社会资本相同=0	84.76%
		丈夫参与团体多=1	8.38%
		妻子参与团体多=2	6.86%
控制变量	性别观念	夫妻性别观念差不多=0	46.76%
		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1	30.95%
		妻子性别观念更传统=2	22.29%
	年龄	连续变量	30.27
	户口	农业户口=0	85.05%
		非农业户口=1	14.95%
	是否中共党员	否=0	97.86%
		是=1	2.14%
	职业类型	无职业=0	8.33%
		生产和服务人员=1	65.52%
		办事人员及以上=2	26.15%
	地区	东部=0	41.43%
		中部=1	30.19%
		西部=2	28.38%
	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1.59

四、实证分析

(一)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有显著负面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	丈夫	妻子	Suest检验 P 值
经济资本差异(收入相当=0)			
丈夫收入更高	0.035 (0.183)	-0.441** (0.153)	0.0453*
妻子收入更高	0.090 (0.205)	-0.066 (0.161)	
文化资本差异(受教育程度相同=0)			
丈夫受教育程度更高	-1.303* (0.533)	0.297 (0.548)	0.0546
妻子受教育程度更高	1.543 (1.037)	0.046 (0.449)	
个人社会资本差异(人缘关系差不多=0)			
丈夫人缘关系更好	-0.164 (0.324)	-0.663* (0.269)	0.2675
妻子人缘关系更好	-0.556 (0.295)	0.217 (0.269)	
家庭社会资本差异(父母都帮助/都不帮助=0)			
仅丈夫父母帮助照料	-0.485** (0.169)	0.065 (0.132)	0.0117*
仅妻子父母帮助照料	-0.247 (0.233)	-0.179 (0.180)	
团体社会资本差异(相同=0)			
丈夫参与团体多	0.058 (0.274)	0.106 (0.216)	
妻子参与团体多	0.002 (0.310)	-0.041 (0.239)	
性别观念(性别观念差不多=0)			
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	0.391* (0.182)	-0.412** (0.137)	0.0004***
妻子性别观念更传统	-0.039 (0.187)	0.426** (0.160)	

(续表)

变量名	丈夫	妻子	Suest检验P值
年龄	-0.063* (0.028)	-0.046* (0.019)	0.6196
是否中共党员(否=0)			
是	-0.038 (0.454)	0.460 (0.525)	
职业类型(无职业者=0)			
生产和服务人员	0.088 (0.470)	-0.489** (0.188)	0.2092
办事人员及以上	0.177 (0.486)	-0.313 (0.220)	
户口(农业户口=0)			
非农业户口	-0.317 (0.211)	0.415* (0.183)	0.0092**
地区(东部=0)			
中部	-0.262 (0.178)	-0.154 (0.145)	
西部	-0.177 (0.186)	-0.376* (0.147)	0.4033
子女数量	0.042 (0.116)	-0.006 (0.090)	
F	39.72	66	
Pseudo R ²	0.0271	0.0282	
N	1050	1050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研究结果显示,夫妻经济资本差异、文化资本差异、社会资本差异会显著降低青年的婚姻满意度。对妻子而言,丈夫收入高于妻子会显著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尽管有些研究表明,丈夫收入高会提高妻子对丈夫经济贡献的满意度^[27],但丈夫收入远高于妻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妻子可能因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而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婚姻满意度下降。丈夫的个人社会资本高于妻子会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即当丈夫的人缘关系更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的支持更多时,妻子的婚姻满意度降低。对丈夫而言,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时,其婚姻满意度下降,可能的解释是文化程度高的丈夫因难以与文化程度低的妻子产生共鸣而容易对婚

姻不满。丈夫的家庭社会资本高于妻子会降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即丈夫的父母帮助照料更多时,丈夫更容易对婚姻不满,常表现为婆媳冲突引发的夫妻矛盾。团体社会资本差异对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团体机构提供的社会支持差异并非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主要社会资本形式。

从对回归系数差异性的似不相关模型检验结果来看,经济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0453,在5%的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经济资本差异对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即仅对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同理,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0117,在5%的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对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仅对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

从控制变量来看,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会显著提高丈夫的婚姻满意度、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0004,在0.1%的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是显著的。作为传统性别观念体系下的受益者,传统性别观念更强的丈夫对妻子的角色要求更容易提高自己的婚姻满意度,但会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当作为传统性别观念体系下弱势方的妻子性别观念更传统时,妻子可能会降低对丈夫的要求,从而使婚姻满意度有所提高。年龄越大,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都有所下降,职业类型、非农业户口、西部地区仅对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是否中共党员、子女数量对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

(二)城乡差异分析

关于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不应忽视城乡差异。有研究表明,“高攀”丈夫的女性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优势只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贫困的地区较为明显,在城市和富裕的地方则不显著,说明“高攀”对女性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有关系^[28]。这启发本文在研究青年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时也应考虑城乡差异。本文对城市和农村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拟合,并采用似不相关模型进行Suest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分城乡的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	城市		Suest	农村		Suest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经济资本差异(收入相当=0)						
丈夫收入高	-0.783	-0.597		0.201	-0.441**	0.0124*
	(0.501)	(0.476)		(0.200)	(0.165)	
妻子收入高	-0.787	-0.685		0.289	-0.015	
	(0.525)	(0.485)		(0.226)	(0.174)	
文化资本差异(受教育程度相同=0)						
丈夫受教育程度更高	-0.322	-0.174		-0.246	0.255	
	(0.568)	(0.789)		(0.322)	(0.255)	

(续表)

变量名	城市		Suest	农村		Suest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妻子受教育程度更高	0.632 (1.182)	-1.023 (0.534)		0.757 (0.417)	0.261 (0.276)	
个人社会资本差异(人缘关系差不多=0)						
丈夫人缘关系更好	-0.018 (0.786)	-1.589* (0.748)	0.2481	-0.261 (0.361)	-0.554 (0.291)	
妻子人缘关系更好	-1.621* (0.804)	-0.115 (0.829)	0.1836	-0.454 (0.327)	0.256 (0.287)	
家庭社会资本差异(父母都帮助/都不帮助=0)						
仅丈夫父母帮助照料	-1.212** (0.450)	-0.212 (0.413)	0.1067	-0.358 (0.186)	0.107 (0.142)	
仅妻子父母帮助照料	-0.302 (0.569)	-0.714 (0.539)		-0.200 (0.261)	-0.063 (0.194)	
团体社会资本差异(相同=0)						
丈夫参与团体多	-0.378 (0.590)	-0.905 (0.633)		0.328 (0.336)	0.287 (0.236)	
妻子参与团体多	0.345 (0.733)	-0.276 (0.530)		-0.088 (0.350)	-0.012 (0.276)	
性别观念(性别观念差不多=0)						
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	-0.033 (0.476)	-0.609 (0.401)		0.472* (0.203)	-0.362* (0.148)	0.0009***
妻子性别观念更传统	0.226 (0.502)	0.056 (0.508)		-0.014 (0.204)	0.472** (0.170)	0.0702
年龄	-0.074 (0.081)	-0.021 (0.063)		-0.061* (0.030)	-0.047* (0.020)	0.6948
是否中共党员(否=0)						
是	0.231 (0.905)	-2.301* (1.102)	0.1502	-0.296 (0.549)	0.952 (0.608)	
职业类型(无职业者=0)						
生产和服务人员	-0.154 (0.965)	-0.785 (0.780)		-0.151 (0.590)	-0.446* (0.196)	0.6022

(续表)

变量名	城市		Suest	农村		Suest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办事人员及以上	0.244 (0.957)	-0.580 (0.813)		-0.145 (0.612)	-0.326 (0.233)	
地区(东部=0)						
中部	0.118 (0.445)	-0.842* (0.411)	0.1362	-0.342 (0.200)	-0.077 (0.158)	
西部	0.341 (0.514)	-0.529 (0.456)		-0.291 (0.205)	-0.412** (0.158)	0.6428
子女数量	0.540 (0.416)	0.079 (0.339)		-0.008 (0.122)	-0.000 (0.095)	
F	21.87	27.67		29.41	53.99	
Pseudo R ²	0.0880	0.0905		0.0244	0.0266	
N	159	155		891	89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从表3可以看出,夫妻资本差异对城市、农村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方向相同,均为负面影响。然而,夫妻经济资本差异仅对农村青年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差异仅对城市青年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在农村夫妻中,丈夫收入更高会显著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对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为0.0124,显著性水平为5%。在城市夫妻中,丈夫的个人社会资本更高即人缘关系更好会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的个人社会资本更高也会降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丈夫父母帮助照料更多会降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文化资本差异和团体社会资本差异对城市和农村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影响。从性别观念来看,性别观念仅影响农村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城市夫妻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在农村夫妻中,丈夫的性别观念更传统会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提高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妻子的传统性别观念更强则会提高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夫妻经济资本差异是导致农村青年婚姻满意度降低的主要资本差异类型,夫妻社会资本差异是导致城市青年婚姻满意度降低的主要资本差异类型。

(三)地区差异分析

在研究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时也应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本文将中西部样本进行合并,分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青年夫妻资本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分地区的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	东部		Suest	中西部		Suest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经济资本差异(收入相当=0)						
丈夫收入更高	-0.167 (0.285)	-0.362 (0.229)		0.172 (0.244)	-0.535* (0.212)	0.0283*
妻子收入更高	0.198 (0.350)	0.272 (0.260)		0.105 (0.263)	-0.307 (0.213)	
文化资本差异(受教育程度相同=0)						
丈夫受教育程度更高	-0.630 (0.483)	-0.426 (0.435)		-0.235 (0.332)	0.337 (0.289)	
妻子受教育程度更高	1.149 (0.758)	0.176 (0.393)		0.590 (0.461)	-0.060 (0.308)	
个人社会资本差异(人缘关系差不多=0)						
丈夫人缘关系更好	-0.222 (0.590)	-0.343 (0.452)		-0.356 (0.392)	-0.897** (0.342)	0.3065
妻子人缘关系更好	-0.037 (0.672)	-0.170 (0.487)		-0.750* (0.342)	0.338 (0.326)	0.0338*
家庭社会资本差异(父母都帮助/都不帮助=0)						
仅丈夫父母帮助照料	-0.726** (0.282)	-0.012 (0.211)	0.0419*	-0.355 (0.215)	0.143 (0.173)	
仅妻子父母帮助照料	-0.307 (0.413)	-0.464 (0.295)		-0.277 (0.287)	0.019 (0.232)	
团体社会资本差异(相同=0)						
丈夫参与团体多	-0.066 (0.425)	0.403 (0.358)		0.327 (0.377)	-0.053 (0.281)	
妻子参与团体多	-0.330 (0.469)	-0.191 (0.374)		0.237 (0.421)	0.102 (0.313)	
性别观念(性别观念差不多=0)						
丈夫性别观念更传统	0.502 (0.310)	-0.362 (0.216)		0.317 (0.230)	-0.497** (0.181)	0.0062**
妻子性别观念更传统	-0.251 (0.301)	0.338 (0.261)		0.145 (0.245)	0.450* (0.207)	0.3408

(续表)

变量名	东部		Suest	中西部		Suest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丈夫	妻子	检验P值
年龄	-0.052 (0.046)	-0.041 (0.031)		-0.066 (0.036)	-0.051* (0.024)	0.7286
是否中共党员(否=0)						
是	-0.678 (0.772)	0.547 (0.898)		0.364 (0.586)	0.677 (0.663)	
户口(农业户口=0)						
非农业户口	-0.540 (0.332)	0.574 (0.300)		-0.154 (0.281)	0.278 (0.236)	
职业类型(无职业者=0)						
生产和服务人员	-0.549 (1.109)	-0.440 (0.333)		0.263 (0.550)	-0.557* (0.231)	0.1372
办事人员及以上	-0.468 (1.127)	-0.277 (0.368)		0.353 (0.577)	-0.350 (0.284)	
子女数量	0.256 (0.211)	-0.288 (0.156)		-0.042 (0.139)	0.147 (0.114)	
F	29.26	31.79		19.97	47.91	
Pseudo R ²	0.0506	0.0346		0.0227	0.0337	
N	439	431		611	619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研究结果显示,夫妻经济资本差异仅对中西部青年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差异对东部和中西部青年婚姻满意度都有显著负面作用。其中,个人社会资本差异仅对中西部青年婚姻满意度有显著负面作用,家庭社会资本仅对东部青年婚姻满意度有显著负面作用,团体社会资本差异对东部和中西部青年婚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文化资本差异对东部和中西部青年婚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中西部地区样本,夫妻经济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0283,夫妻个人社会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0338。对于东部地区样本,夫妻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的p值为0.0419。以上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5%。这一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对丈夫和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仅对丈夫或妻子一方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夫妻经济资本差异和传统性别观念影响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类似,即仅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青年婚姻满意度。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使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青年夫妻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资本差异、文化资本差异、社会资本差异三个维度研究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并对城乡和地区差异展开进一步分析。

研究发现,夫妻经济资本差异、文化资本差异和社会资本差异都会显著降低青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丈夫相对较高的经济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会降低妻子的婚姻满意度,丈夫相对较高的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会降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团体社会资本差异对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夫妻资本差异对青年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

从城乡差异来看,夫妻经济资本差异仅对农村青年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差异仅对城市青年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来看,夫妻经济资本差异仅对中西部青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个人和家庭社会资本差异分别降低中西部、东部青年婚姻满意度。这也说明,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应特别关注夫妻间较大的经济资本差距给婚姻带来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地区,则要重点关注夫妻社会资本差异带来的婚姻满意度降低。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差异中,家庭社会资本差异是降低城市和东部地区青年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共同因素,说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和东部地区,尽管家庭结构趋向于核心化,双方父母在青年夫妻关系中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这与青年夫妻养育子女时需要依赖父辈的经济和人力资本有关。此外,本文还发现,传统性别观念差异会降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青年婚姻满意度。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说明,夫妻资源差异并非完全如相对资源理论所述,会导致夫妻权力自发调整以满足双方的婚姻需求,事实上同样也会给婚姻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现代化加速演进的个体化社会结构中,要尤为关注夫妻资源差异给婚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婚姻满意度下降乃至更为严重的婚姻问题。

本研究对提高青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有一定的启示。其一,青年男女在择偶时和婚后要提前预判夫妻资本的较大差异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青年女性要慎重考虑因为丈夫收入高而放弃工作,经济上完全依附他人会将自己推向被动的境地。其二,青年男女应拓宽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父母、亲属和其他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取支持;在寻求各自父母帮助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代际关系引发的婚姻问题,以共同推动核心家庭良性发展为目标经营婚姻关系。其三,不应忽视夫妻资本差异影响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要尤为关注夫妻经济资本差异给婚姻满意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99980001204/attr/355717.pdf>
- [2] 陈 蓉:《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 [3][14] Blood, R. O., Wolfe. D. M..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0, pp.12-13.
- [4][27] 许 琪:《挣钱还是做家务——丈夫的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对妻子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载《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3期。
- [5] 郭 婷 秦雪征:《婚姻匹配、生活满意度和初婚离婚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载《劳动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 [6] Goode, W. E.. Force and Violence in 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71, (33).
- [7] 续 继 黄娅娜:《性别认同与家庭中的婚姻及劳动表现》,载《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 [8] 陈佳鞠:《夫妻权力结构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 [9] 毕文芬 初奇鸿:《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载《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 [10] 王 杰 李姚军:《教育婚姻匹配与婚姻满意度》,载《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2期。
- [11] 魏新岗 邱燕鸣 李德显:《婚配模式对初婚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载《黑河学刊》,2020年第5期。
- [12] 朱 斌 乔天宇:《“妻管严”的婚姻生活幸福吗?——基于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的分析》,载《青年研究》,2015年第5期。
- [13] 杨 文 江 修 万 苑:《“才子佳人”真的幸福吗?——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载《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3期。
- [15] 张 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129页。
- [16][17] 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 康 李 猛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6、162页。
- [18] 李成华 靳小怡:《夫妻相对资源和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婚姻暴力的影响 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载《社会》,2012年第1期。
- [19][20] 赵延东 何光喜 朱依娜:《预防与抑制:社会资本在婚姻暴力中的影响机制初探》,载《社会》,2011年第1期。
- [21] 晏月平 张舒贤:《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 [22] 李卫东:《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载《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6期。
- [23] 马春华:《性别、权力、资源和夫妻间暴力——丈夫受虐和妻子受虐的影响因素分析比较》,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9期。
- [24] 李建新 郭牧琦:《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载《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6期。
- [25] 余晓艳 魏樊樊:《婚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之陕西数据分析》,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 [26] 卿石松 姜雨杉:《夫妻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28] 雷晓燕 许文健 赵耀辉:《高攀的婚姻更令人满意吗?婚姻匹配模式及其长远影响》,载《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1期。

(特约编辑:张 宪)